

知識天地

徐家匯博物院與清末民初中國自然史發展

戴麗娟副研究員(歷史語言研究所)

民初關心中國博物館事業的論者在追溯中國現代博物館起源時，咸認為成立於1868年的徐家匯博物院為中國最早的博物館。此博物院之成立實與1842年後耶穌會重返中國之發展息息相關，其歷史可略分為兩個時期：前期始於該院創辦人韓伯祿神父（Pierre Marie Heude, 1836-1902）抵達中國的年代1868年，結束於1930年博物院與震旦大學之結合。在此時期，該機構一直被稱為「徐家匯博物院」。後期則從1930年博物院遷入震旦大學開始，直到震旦大學與博物院皆因時局變化而於1952年終止運作。此時期博物院的中文名稱改為「震旦博物院」，外文名稱則為Musée Heude，用以紀念其創辦者。以下便依此二時期依序介紹。

一、徐家匯博物院時期（1868-1930）

在這個「無中生有」的草創階段，博物院工作重點是廣泛收集標本，並加以整理、研究、發表，期能增進歐人對於中國境內生物的認識。這個工作主要由韓神父執行。韓神父在1868年1月9日抵達上海，開始歷時三十多年的在華生涯。從1869到1880年，他以江南為主要範圍，總共進行了十多趟採集之旅，主要收集魚類、介殼類、龜類的標本。從1880年代中期到1900年七月在河內病倒為止，他也曾多次前往東南亞、東北亞，所以博物館收藏有當時安南、暹羅、馬來西亞、雅加達、麻六甲諸島、滿洲、韓國、日本，甚至西伯利亞東部等地的動植物標本。憑藉這些標本，他於1874至1885年間在法國陸續出版了十薄冊的《中國中部與南京地區河產介殼類》（*Conchyliologie fluviatile de la province de Nanking et de la Chine centrale*），後來更將之集結成一部圖文並茂的巨冊。這些研究成果陸續受到國際相關學界的重視，也奠定他在這方面的名聲。

跟當時許多在華的探險家、外交官、傳教士一樣，他常將標本寄到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以供鑑定或收藏。然而，與眾不同的是，他所收集的標本最後泰半留存於徐家匯博物院，而在當時的文章或指南中，該博物館的標本數量常被譽為東亞第一。韓神父過世之後，其繼任者栢永年神父（Frédéric Courtois, 1860-1928）、松梁材神父（Auguste Savio, 1882-1935）、鄭璧爾神父（Octave Piel, 1876-1945）繼續擴大收藏的範圍。到了1920年代末，當博物院打算遷入震旦大學校園內時，它已是一座在哺乳類、鳥類、昆蟲類等方面之標本收藏相當齊備的自然史博物館。除了積極擴增藏品之外，該博物館也對中國當地的研究者提供許多鑑定上的協助。

在豐富標本收藏的同時，博物館的神父們亦致力於研究與發表。上述的中國貝殼相關書籍在法國出版之後，他們積極規劃徐家匯當地的出版工作。1880年，博物館開始將內部的研究成果發表於新設的出版品《中華帝國自然史論集》（*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naturelle de l'Empire chinois*）。此時所有的印刷製作已直接在位於徐家匯的土山灣孤兒院附設印刷工場（即後來廣為人知的土山灣印書館）中進行。在1880-1920年代，這套叢書前後共出版了六大冊，其中有許多動物與植物標本的石印圖版。早期的圖版均出自博物院一位擅於解剖與繪圖的蔣其儀（Charles Rathouis, 1834-1890）之手；蔣神父在土山灣孤兒院培養的一批當地的年輕學徒後來也加入繪製工作。這些圖版的技法與同時期在西方流傳的博物誌圖版並無二致，而與一般在討論西畫傳入中國後所產生的東西畫法混合的例子（例如郎世寧的宮廷洋畫、蘇州桃花塢年畫，或是廣州口岸出現的貿易畫）大不相同。最主要的差別在於前者呈現的多是動物頭骨、牙齒剖面，而不只是動物或植物的擬真再現。畫者除需掌握相當程度的素描技法，亦需解剖學知識與顯微鏡觀察能力。而且，這些圖版的科學用途十分明確，不易被當作裝飾用的花鳥百獸圖。在照相設備未普及、照相印刷技術未成熟的那個年代，植物或動物圖譜之類的博物學繪圖在科學知識的生產與傳播上扮演一定的角色。它可以彌補文字說明之不足，又可當作採集者或研究者觀察的證據，而且當模式標本遺失、損毀、或無法取得時，能夠充作鑑定、分類的替代品；它亦是相關研究者之間易於交換的複本，同時又像是一種



韓伯祿神父



土山灣青年畫師所繪之標本圖

「紙上博物館」，提供給遠方的同好一種觀察、辨識的對象。西歐在十六世紀已開始發展相關的製作與出版，而其呈現方式在十八世紀末已有一套約定俗成的規則。中國原本並不重視這種擬真的科學繪圖，而這類圖版製作通常需要有精確繪圖、刻板、印刷的功力；土山灣青年畫師在本身從事科學工作的神父指導下，在十九世紀末的出版品中展現了這方面的專業能力。

除了與耶穌會自身設置的各種機構有不同程度的合作之外，徐家匯博物院也試圖與上海當地同性質的機構交流。然此時由中國人管理、有意識地從事標本採集與研究的機構尚未出現，因此，該博物院此時主要的交流對象不外乎是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rth China Branch）所建立的博物院，亦即一般所稱之「上海博物院」（1874年建立）。在英國探險家兼自然史學者蘇柯仁（Arthur de Carle Sowerby, 1885-1954）進入上海博物院主事之後，兩個博物館之間的交流更加頻繁。出生於山西太原的蘇柯仁，父親是在中國佈道逾四十年的浸禮會教士蘇道味（Arthur Sowerby），其高曾祖與曾祖在英國植物學發展史皆曾扮演重要角色。蘇柯仁在中國度過童年，能說流利中文，成年後曾參加多次長途探險之旅，採集當地標本，其中最有名的一次應是於1909年加入由美國富商Robert Sterling Clark（1877-1956）所組織的探險隊，前往山西、陝西、甘肅等地進行探勘。他繼而發表多部著作，從此確立自己在中國博物學方面的研究興趣和名聲。蘇柯仁在1916年成為文會會員，1920年代初期決定定居上海後，成為該會的活躍份子，並於1927年成為正式的名譽院長，直到1946年才卸職。這段期間內，兩個博物館一直維持良好的交流關係。他在自己所創辦的刊物《中國科學美術雜誌》（*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中常報導這兩個自然史博物館的活動。戰爭期間他曾淪為俘虜，遭到軟禁，而在1946年秋天因健康因素而決定回英國長期休養時，他選擇將他自己收藏的眾多生物標本、古文物與書籍悉數捐贈給震旦博物院，可見他對此機構的重視與信任。

關於這兩個博物院的交流合作，值得注意的還有動物標本製作員的培訓。此時期訓練出來的標本剝製師之一還因其技藝在家族成員中不斷傳承，至今已五代男丁以此為專業。原來上海博物院在籌備期間即相當注重日後的陳列與公開展覽，所以亟需一位標本製作師，但卻久覓未得。恰巧法國遣使會譚衛道神父（Armand David, 1826-1900）在中國境內採獵途中曾培訓一名中國助手王樹衡，由他協助整理和製作標本。譚神父返法後，這位標本製作師曾一度在徐家匯博物院工作；上海博物院成立後便直接雇用了他。但在王員之後，博物院又陷於無人專責管理標本的窘境，直到1907年才出現轉機。這一年，海關稅務官員兼鳥類學專家拉圖許（John David Dignes La Touche, 1861-1953）加入文會，並受託整理博物院內的鳥類標本，製作相關目錄。隨他前來的一位由他親自栽培的中國助手唐旺旺（本名唐啟旺）也在此時進入上海博物院擔任專職的標本剝製師。唐旺旺於1922年轉往廈門大學服務，蘇柯仁乃聘用其子唐仁官、唐瑞玉、唐瑞耿接手，並加強訓練他們的技術。唐旺旺於1932年初過世時，蘇柯仁在《中國科學美術雜誌》中特別為文紀念，文中提到唐之父親已有類似製作小型動物標本的經驗，而唐旺旺同輩共有六兄弟，全部都成為自然標本採集者。從目前零星資料可知，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於1928年成立後，唐家第三代唐善康、唐瑞玉即進入此機構擔任標本製作員，同時也被派往不同地區協助採集標本。中央研究院於1929年開始在南京籌備自然歷史博物館後，該家族第三代唐開品、唐瑞金也曾在此機構服務。唐家在這方面的技藝傳承至今未曾中斷，家族成員中也有人成為生物學教授，而不再只是動物標本剝製師。

整體而言，從徐家匯博物院成立後一直到遷入震旦大學為止，院內神父所做的工作，不管是標本收集、整理、研究，以及成果發表，都頗受好評。在國際間對於中國地區物種及其地理分佈十分陌生的情況下，這些出版品成為可靠的參考工具書。由於當時中國本身還沒有任何專門機構從事這類工作，徐家匯博物院為此領域奠定了一個重要基礎。

二、震旦博物院時期（1930-1952）

在這段時期之初，博物院與震旦大學結合，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震旦大學本身也是耶穌會在華的教育事業之一，但其成立背景與蔡元培提倡新學有關。這所大學於1903年在馬相伯主持下成立，後才因故改由耶穌會全面主導。安頓完成後的震旦博物院與中國當地的科研人才開始有較多的交流，這點主要從其藏品研究和出版品中可以觀察到。在成果發表方面，新的博物院捨棄《中華帝國自然史論集》那種出刊間距較長、開本偏大的出版模式，改而發行小開本、不定期出版的刊物，將各領域的整理、研究成果陸續刊登於數個叢刊中。此外，出版發表的語言也從過去的純粹法文，改成英法文兼容。博物院在此時期的主要出版品包括*Notes d'Entomologie chinoise*（中國昆蟲學論叢）、*Notes de Botanique chinoise*（中國植物學論叢）、*Notes de Malacologie chinoise*（中國軟體動物學論叢）等等。

這些出版品顯示，早期博物院的神父們的主要研究對象是貝類、哺乳類與植物；1920年代開始，研究重心逐漸轉向昆蟲研究；在1930年代以後的出版品中，昆蟲研究已佔多數。這樣的轉移一方面與主事的神父們本身的專長有關，另一方面也呼應著當時中國的生物學發展和農業發展需求。由於對稻、棉、桑、果等方面害蟲的研究與防治的需求日趨迫切，加上當時中國昆蟲分類方面的研究還有待拓展，因此從1920年代中葉起，中國陸續出現數個昆蟲學研究機構，例如為了全面整治棉害而成立的第一個害蟲防治機構江蘇昆蟲局（1922）、中國科學社在南京創設的生物研究所（1922）、在北平設置的靜生生物調查所（1928）、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1934）、專門統籌全國植物病蟲害防治工作的中央農業實驗所（1933）等等。無論是在基礎研究或應用方面，中國昆蟲學在1930年代達到第一次研究高峰。相關研究需要大量的標本為依據，而在這方面，震旦博物院以及另一個也是法國耶穌會士所建立的天津北疆博物院由於成立時間早、累積的標本數量遠勝於其它機構，故能提供給學者許多研究上的便利。事實上，此時期的震旦博物院亦積極與各國學者合作鑑定其收藏的標本，並將成果發表在該院的出版系列中。其中以《中國昆蟲學論叢》的成果最為顯著：從1929到1948年，該系列共出版十二冊，文章大多以法文和英文寫成。曾在該刊物發表的四十多位作者中，中國籍的昆蟲學學者就有十多位，例如陳世驥、劉君諤、劉崇樂、陸近仁、馬駿超、汪仲毅、楊惟義、張光朔、黃修明、陶家駒等人。此刊物與《浙江昆蟲局年鑑》（1931-1936）、《靜生生物調查所學報》（1931-1941）、《昆蟲與植病》（1933-1937）、《趣味的昆蟲》（1935-1938）被視為當時中國昆蟲學的五個主要學術刊物，而《中國昆蟲學論叢》不僅是其中最早創刊的，而且當其它刊物或因為經費問題或因為戰亂而陸續停刊後，它仍持續發行，直到1948年才終止。

另例如《中國軟體動物學論叢》，雖然從1934到1945年僅出版了六薄冊的鑑定報告，而且主要以震旦博物院的藏品為研究對象，但主要作者包括中國科學社創辦人之一、當時在中國生物學界極負盛名的秉志（1886-1965），以及當時任職於靜生生物調查所的年輕學者閻敦建。秉志與震旦博物院之淵源還不止於此。1937年南京淪陷後，秉志服務的南京中央大學全校搬遷至重慶，秉志卻因妻子重病臥床，只得續留上海。因為他聲名在外，日人積極尋求跟他合作。他為了不為敵人所用，遂改名易容，隱匿行蹤。在隱居期間，他以震旦大學實驗室及博物館為藏身之所，繼續從事研究。

在科研功能之外，震旦博物院亦著重科普功能。1933年，遷入新建築後的博物院在內部佈置完畢後對外開放。建築採L形，內部分成兩個部份。建築物面對大馬路的部份為普通館，採開放制，供一般民眾自由參觀。建築物轉東南面是面對校園的一端，被設計為實驗室、圖書館及各種標本室，專供研究者使用，只對專業工作者開放。1933年6月1日，博物院正式對外開放參觀，受到各界矚目，光是第一年的參觀紀錄就達2588次（含個人與團體）。1939年，博物院為慶祝成立七十週年，於5月21日至6月5日對一般民眾免費開放。據說在短短兩週內就有七萬多人前來參觀。

從1930年代博物院的發展看來，主事者的理想正逐步實現中，無奈戰事打亂了一切規劃。戰爭結束後，震旦大學企圖延續原有的博物院計畫；然而，時至1952年，大部份的外籍神父被迫離開中國，震旦博物院無以為繼，終於在這一年結束長達八十三年歷史，而其收藏也陸續被執政當局接收，並分散到不同科研機構。

整體而言，這個自然史博物館雖然完全是由法國耶穌會士主導經營，但是在其八十多年的歷史中，不論是在標本收藏、整理、鑑定，或是在成果發表交流，乃至於對中國當地自然史的基礎研究和興趣啟發等方面，都作出了相當重要的貢獻。在一般認為是中國近代科學發展「黃金時期」的1930年代，它處於震旦大學內，尤其有助於培育當地人才、並有利於在地研究者之合作交流。它的歷史因此值得我們投以更多的目光。